



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材·美术设计理论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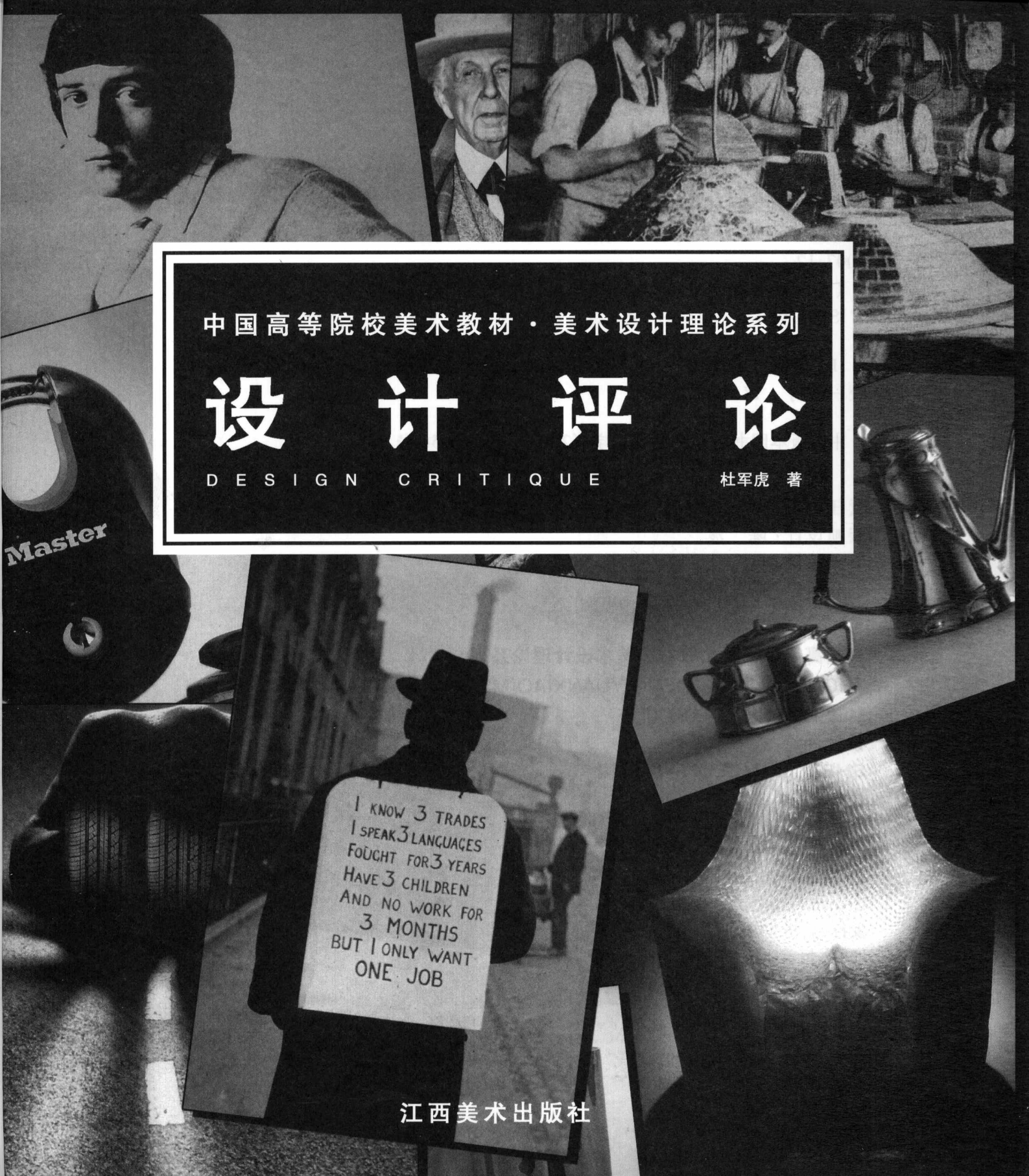
设计评论

DESIGN CRITIQUE

杜军虎 著

I KNOW 3 TRADES
I SPEAK 3 LANGUAGES
FOUGHT FOR 3 YEARS
HAVE 3 CHILDREN
AND NO WORK FOR
3 MONTHS
BUT I ONLY WANT
ONE JOB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材·美术设计理论系列

设计评论

DESIGN CRITIQUE

杜军虎 著

I KNOW 3 TRADES
I SPEAK 3 LANGUAGES
FOUGHT FOR 3 YEARS
HAVE 3 CHILDREN
AND NO WORK FOR
3 MONTHS
BUT I ONLY WANT
ONE JOB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设计评论 / 杜军虎著. —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7.12

(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材·美术设计理论系列)

ISBN 978-7-80749-366-2

I. 设… II. 杜… III. 设计—艺术评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7956号

责任编辑：刘 杨 陈 波

装帧设计：陈 波

版式设计：佳 佳

电脑制作：蒋 博

中国高等院校美术教材·美术设计理论系列

ZHONGGUO GAODENG YUANXIAO MEISHU JIAOCAI

MEISHU SHEJI LILUN XILIE

设计评论

SHEJI PINGLUN

杜军虎 著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E-mail jxms@jxpp.com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8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

ISBN 978-7-80749-366-2

定价 25.00元

前言

Preface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设计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行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世界中,正在显示其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为人类的生活世界赋予物质性的形式、结构和秩序,而且以一种具体的物质化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整个生活世界。我们今天在生活世界和周围环境中看到的所有的人造物,大到城市的规划、城市建筑的设计,小到最平常的生活用具的设计,都是或多或少地经过了设计的物质化成果。设计不仅为人类的生存世界和生活世界创造具有物质性实用功能的客体系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世界创造最感性、最直接的文化类型。它以最直接的形式切入我们的整个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中。在这个被设计了的世界,我们无法摆脱设计对我们的影响。

设计在我们当今社会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设计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从产品生产者到消费者要求、从产品功用向产品体验等等方面的转向,充分显示了设计活动不仅从产品的客体形式、结构和功能来设计自己的作品,而且更加关注生活世界中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通过设计的创造性来建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人类生活世界。

设计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设计不能将它孤立于时代文化之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界定,除了“后现代文化”、“后工业文化”和“非物质性文化”这些耳熟能详的称谓之外,还有一些近几年才出现的词,如“图像文化”和“大审美经济文化”等。诸多的称谓从各自视角和层面上展示了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实质。同时,它们也能从各层面阐述和研究设计。

近来,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就以“大审美经济文化”阐述设计,为设计存在的必然性和目的性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凌教授指出,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相结合的经济。人们进行消费,不仅仅是“买东西”,更希望得到一种美的体验或情感

体验。

很多研究当代文化的学者都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越来越表现出“生活刻板化”和“个性碎片化”的弊端。“生活刻板化”是指现代技术为了生产和使用的方便,把一切变得千篇一律。“个性碎片化”是指人和自然脱节、感性和理性脱节,人成为被计算使用的物质,成为物化的存在和机械生活整体的一个碎片。凌教授指出,大审美经济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变感性被理性压抑、精神活动被忽视和被冷漠的现象,把感性从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使感性和理性达到和谐统一,从而以新的感觉方式知觉世界。

工业经济形态中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效用当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维护工业经济形态的核心价值,即理性价值,忽视情感。主流经济学在长期发展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可是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一些经济学家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认为“有钱不一定快乐”,GDP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幸福水平同等程度的提高。在经济水平低下时,快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钱,可是在生活比较富裕后,快乐并不正比例地取决于有钱。因此,有人提出,不能把效用,而要把审美体验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1999年,美国的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问世。他们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的新纪元,体验经济已经逐渐成为继服务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用户们不再仅仅是因为商品的功能而去购买,而是出于在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美好体验。类似地,用户们接受服务不是因为提供服务的作用,而是因为在享受服务过程中难以忘记的经历。”^[1]

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使人产生完整的审美体验的生活。体验效用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经济学2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在当前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制造商们必须关注顾客在使用他们商品时的体验,从而保持商品的竞争力,而创造并提供使顾客产生强烈审美体验的产品,就要经过“设计”这一环节。

设计对于人类的的生活和发展来说是如此的重要,研究设计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设计理论是一个关于设计现象研究的大系统。当前我国的设计理论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其中,对担负监察和评价任务的设计评论的研究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设计的发展离不开设计评论。如果说设计确定是在前进着,那绝对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前进的。

设计评论尽管是作为设计理论的一部分而存在着,但它却保留了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设计评论能够鉴别和判断设计实践以及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我们知道任何设计创作和欣赏都是基于一定的设计理论,但是,遵循设计理论并不能确保我们在进行设计创作时,能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出差错的地方很多,例如,设计行为没能在众多设计理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论,以及设计理论已经失去了对设计实践的指导的时效性等等因素。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对设计理论产生负面影响。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维持设计理论指导性,只有依靠设计理论对自身的批判性行为,即设计评论。

设计是对单纯的物质性范畴的超越,走向了一个融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物质形式与审美形式、日常生活与艺术知觉于一体的新的文化领域。它是人类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设计师为人们提供一个应该如此的生活理想和幻象,使人们为实现理想生活而改造现实。设计活动能集中表达出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超越的情愫。在维持对理想的追求外,设计必须遵循理想机制原则对设计活动进行选择、评价、规范,使设计更有利于表征理想,使设计表征的理想更合理、更切合实际,也使现实与理想交流、沟通。因此,设计评论家是根据理想来评价作品,提升设计的品位和价值的,同时通过批判来表征理想,实现理想。理想驱动设计评论家滋生出评价热情和欲望,通过评论家的作用,指引设计师去完成设计的任务,实现设计的价值。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注重设计的时代,加强研究设计评论理论

对于保证设计活动健康发展和完善设计理论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在当前的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设计评论的研究脱离不了文化环境的影响。设计评论的研究必然是在多元化的文化视角和方法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例如,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设计评论的性质和任务;面对某一具体设计现象和作品,我们该如何“合时宜”地应用评论理论和方法;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运用设计历史中存在过的和当前正在使用的评论标准,等等。这些都是研究设计评论的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本书撰写的目的,就是力求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见解,为设计评论理论的建设尽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1]派恩二世、吉尔摩《体验经济》夏业良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版.P105

作者简介:

杜军虎,男,1974年12月生,籍贯安徽合肥。

学习经历:1993年考入安徽大学广告学专业。199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美术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西方美术研究。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工业)设计研究。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主任。



内容简介:

当前,设计处在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它被纳入到一个远比艺术设计本身或产品系统更复杂的关联域中。在这个复杂的关联语境中,设计除了其本身的材料上的、技术上的、功能上的和审美上的因素之外,还与整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发生种种关联,与整个生活世界中的消费群体发生着各种层面的关系。

随着设计的不断发展,设计批评不能简单地囿于艺术和技术之间的争论,其广度和深度都相应地扩大和深化。本书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设计评论的体系化框架,并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不同设计形态对设计评论产生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当前人文学科常用的一些方法论在设计评论行为中的运用。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设计——近代对机器文化批判的成果 / 1

- 第一节 近代人文主义者对机器文化的批判 / 2
- 第二节 拉斯金对机器生产的批判是现代设计的缘起 / 4
- 第三节 设计——机器文化的“补丁” / 6

第二章 设计评论的任务与性质 / 10

- 第一节 设计评论及其任务 / 11
- 第二节 设计评论的性质 / 14
- 第三节 设计评论的多元化现象 / 16
- 第四节 设计评论的现状——批判性的淡化 / 18

第三章 设计评论的形态 / 20

- 第一节 设计评论的动机 / 24
- 第二节 设计评论的形态 / 24

第四章 设计评论中的价值规范 / 29

- 第一节 评论和价值规范 / 30
- 第二节 设计评论中的价值规范 / 35

第五章 手工艺文化及其评论 / 50

- 第一节 农业文化的价值观念 / 51
- 第二节 农业文化认识世界的方式——直觉思维 / 53
- 第三节 手工艺的文化特征 / 54

- 第四节 手工艺的创作方式 / 55
第五节 手工艺运动无力挽回“手工艺” / 58
第六节 如何评价手工艺的价值 / 56

第六章 工业文化与现代主义设计评论 / 65

- 第一节 工业文化的价值观 / 66
第二节 工业文化认识和处理世界的方式——物化 / 67
第三节 适应工业文化的现代主义设计 / 71
第四节 现代主义设计的文化特征——理性主义 / 74
第五节 现代主义设计的创作原则与表现 / 77
第六节 如何评价现代主义设计的价值 / 80

第七章 后工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设计评论 / 85

- 第一节 后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设计 / 86
第二节 后现代哲学观和后现代主义设计 / 90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文化特征——非理性主义 / 93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创作原则与特点 / 95
第五节 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价值 / 103

第八章 设计评论与方法论 / 107

- 第一节 社会学与设计评论 / 109
第二节 符号学与设计评论 / 112
第三节 解释学与设计评论 / 116

第一章

设计——近代对机器 文化批判的成果

在广泛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通过与外在的环境相斗争、相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它表现为人在一切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心态和行为样式,以及这些心态和行为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化的目的是处理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使人过得更好。身为文化的一分子,设计的目的也是如此。

设计是现代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人类设计活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但是作为一门专业(职业)的设计却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出现的。相比其他历史悠久的文化门类,设计算得上是个新丁。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任何一门新兴文化的出现,都是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和环境相斗争、妥协的产物。新兴文化都承载着具体的时代使命——解决它所在的那个时代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门新的文化形态,设计要处理的问题是:消弭机器生产对人们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人文精神生活环境的破坏,维持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形象地说,它的出现就是为了给机器文化打“补丁”,从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第一节 近代人文主义者对机器文化的批判

机器文化在人类历史舞台重装上演,是由英国人詹姆斯·瓦特揭开帷幕的。1789年瓦特设计出了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因为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明,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应运而生。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机器生产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

西方学者一致认为,机器文化的奠基人是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笛卡儿(1596—1650年)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的奠基人之

一。他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理论和模型,提出了以数学为基础、以数学模式的演绎为核心的方法论。他的理论对后世的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伽利略(作者注:伽利略是以数字来规范自然的第一人)和培根做了准备工作之后,笛卡儿所倡导的普遍数学模式这一近代的主导思想变成了近代的激进的自我意识,而且从那时起开始向各种知识领域胜利进军,并且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1]笛卡儿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在认识领域,科学主义成为先进的认识观。科学主义将(以数学为基础)自然科学看做是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是文化的基础和价值中心。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规划自然、征服自然的壮举。

人们公认,人文主义是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只有在人文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出现了主客观分化的认识观。而主体至上和主客两分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但是,当科技在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轨道上深入发展时,就逐步脱离了具体的生活现象,即脱离实践者和实践对象而自成体系。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到科学技术时写道:“说也奇怪,技术固然是人类的产物,但却往往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原理发展,而且与人性或者普遍的生物本性的规律与原理大不相同。可以这么说,自然界总是知道在何时何地停止下来。……其结果,人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自然界总是自我平衡、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而技术则不然……”^[2]

科学技术的这种现象是科学主义的必然结果。当科学主义在工业发展“利好”的推动下,新的认识论和价值观产生了,并且与人文主义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在工业时代,人的认识只有服从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才能被肯定和嘉许。科学主义要求人排除一切感性因素,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将人封闭在科学主义的高墙内,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完整的联系,这和人文主义的“维护人的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原则很难相容。科学主义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立了重重屏障,使人与自然分离。当人类以自然科学规划世界的同时,

亦被他自己制造的原则规划了。无怪乎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霍克海默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人类努力降服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降服人的故事。”^[3]

在近代，笛卡儿的主张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倾向。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持不同意见，坚决与之对抗。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于1725年写了一本《新科学》，这本书恰恰是反对笛卡儿的科学，反对以数学和物理为取向的认识观。1750年，卢梭发表了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在这篇论文中，卢梭认为，随着我们的科学臻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同年，另一部旨在反对笛卡儿的著作问世，这部著作和卢梭的论文一样具有隽永的生命力，它就是的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对由科学决定的近代的说法从美学上加以修正和变革。当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对以“普遍数学模式”对待世界的做法批评得更猛烈、更一针见血。他说：“数的规律的发现是建立在从最早时期起就占支配地位的错误的基礎上的，即建立在存在着相等的事物（但事实上无物与他物相等），至少存在根本的物（但根本没有‘物’）的看法上。复数的假设总是建立在假设有一再发生的某物存在着，但这里恰恰是错误在起作用。我们正在伪造存在者，把并不存在的東西统一起来。”^[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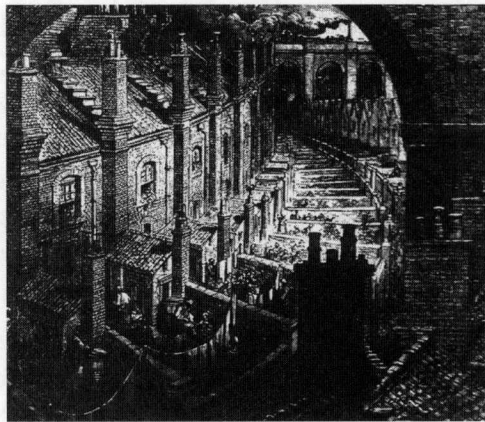
这些学者基本上是基于学术思想的差异对笛卡儿的科学主义提出批评的。他们坚持着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把人看做万物的尺度，以人性、自由和人的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准则，始终和对人的“异化”现象格格不入。但是，到了19世纪，来自于社会角度的批评大有取代学术批评的势头。

机器生产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制造出大量廉价的产品，但是，19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对机器文化的厌恶情绪越来越强烈。机器生产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领域。

在经济领域，不公正的劳资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充满了动荡因素。进入工厂的人们，原本的生活和劳动都处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必须变成工厂的“机器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新型的生活情况。另外，恶劣的工作

环境、微薄的工资以及工厂主对工人的不公正待遇，更加深了工人的敌对情绪，从而产生了工人捣毁机器以及针对工厂主的反抗斗争。1831年，法国里昂爆发了3万工人的武装起义。起义者的口号是：劳动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1834年，里昂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些斗争逐渐点燃了劳资之间的相互仇恨，乃至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

在生活世界，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工厂，例如美国芝加哥从1833年城市规划的300人到1850年发展到3万人，而英国曼彻斯特的增长数量更是惊人，从1760—1830年，“农村人口外流”进入该市，使得该城市的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人口的急剧增加，使他们生活在条件恶劣并没有任何预防措施的环境中，生活条件的恶化导致了疾病的蔓延。首先，住房的建设根本跟不上需求。在城市交通欠缺的情况下，工人只能被安排在离工厂近的“蜗居”。这些住房密集地建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采光、通风、污水处理和公共场所（垃圾站和公共厕所等）的不足。这种情况常常造成粪便、垃圾和污水横流的现象。当时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后，喟叹：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另外，各种工厂的设立破坏了自然环境，污染恶化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工厂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随意排放着废气和废水。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造成了疾病和瘟疫的蔓延，首先是肺结核病



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居住的“贫民窟”

的传播,然后就是1830—1840年英国和欧洲大陆霍乱蔓延。

在文化领域,人们批判机器产品的出现降低了社会的审美品位。尽管机器产品产量高且价格低,但是,机器生产出的产品的外观远远比不上手工艺产品。再加上工厂主为了牟取最大的利润,在没有社会和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生产大量粗制滥造的产品,使得机器产品越发恶名远扬。欧洲的艺术家们普遍认为,这种丑陋的产品充斥了家家户户,会降低欧洲社会曾自诩的艺术审美能力。

机器大生产对整个欧洲施加了强大的改造力,这种改造使得人文主义及人文关怀在机器生产面前的地位岌岌可危。人文主义把人看做万物的尺度,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主张。但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机器大生产并没有实现人文主义者的美好愿望。敌对情绪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最终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运动,波特兰·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写道:“站在人道的立场看,机器主义的早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期。”^[5]

如果我们理解新事物的诞生和发展总会出现一段调整和改进时期的话,我们就不会苛责科学主义和机器大生产,即机器文化。但是,如果让新事物的弊端集中降临到某个具体时代,必然会遭到处于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反抗和仇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使得他们越来越觉察到了人文精神的垂落,所以,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处于极端厌恶机器大生产的敌对情绪中。针对机器大生产这一突然闯入自己领地的莽汉,他们本着人文主义关怀,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口诛笔伐,并提出全新的社会蓝图,展开改造运动,试图消除机器对人“异化”、对文化“物化”的恶果:有的想建立开明国家原型的乌托邦公社,让人们生活在平等的、无拘束的社会,如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有的是从政治经济角度的立场出发,欲通过阶级斗争的途径,改变社会阶级对立的现象,如德国人卡尔·马克思;有的想通过道德教化世俗,使人们生活在人文道德的“理想国”,如英国人狄更斯;也有的试图通过复兴手工艺生产,改变造型丑陋的机器产品,提高人们的生活审美品质,从而抵消来自机器生产的恶劣影响,如现代设计的先驱——英国

人约翰·拉斯金。

第二节 拉斯金对机器生产的批判是现代设计的缘起

在英国艺术史上,约翰·拉斯金(1819—1900年)是继威廉·荷加斯(1697—1764年)之后最伟大的美学家和艺术评论家。

当人们研究拉斯金时,会发现他一生都在寻求解决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危害”的方法。拉斯金早年研究绘画艺术,在牛津大学就撰写了许多艺术评论文章,1843年发表的《现代画家》,在当时的英国影响颇大。当发现机器生产的弊端后,他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对艺术和技术关系的探讨,由于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代表,因此他相继撰写了《建筑的七盏灯》和《威尼斯的石头》(1849年),阐述他对艺术制品的看法。60年代后,拉斯金对机器生产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将艺术放入社会经济学领域里研究,撰写了《艺术的政治经济》,探索机器生产经济环境里艺术的正确方向。

拉斯金不是一个一心埋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个十分活跃的社会实践家。为了传播他的艺术观点,



约翰·拉斯金 速写 詹姆斯·S·迪尔顿

1857年7月,他在曼彻斯特作了两次报告,宣传他关于机器生产和艺术审美关系的学说。1871年,他甚至自己掏腰包,出资1万英镑,创办圣乔治公司,在企业中试验他的学术思想。

拉斯金抵制机器生产,不仅仅抵制低劣、丑陋的机器产品,而且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机器生产方式中。拉斯金拒绝依据机器生产方式设计或制造产品。他对机器大生产的批判是基于对人文主义的坚守和弘扬,这一批判也是现代设计形成的基础。

当时,批评机器大生产的观点主要有两个列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机器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将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工具;二是反对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理性主义(基于“普遍数学模式”)的眼光看待万物,割断人的主观感受。这两方面在拉斯金关于机器生产及产品的著作中都能得到验证。

在机器生产中,工人是被动的,完全从属于机器,他们在机器的“调度”下,完成的是机器交给他们的单调、乏味、死板的动作,劳动中的“最后的自我满足”都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器劳动是非人性的劳动,至少具有非人性的因素、压抑人性的因素。关键是机器不是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人的工具。机器劳动的特点,决定了机器对工人创造性的限制。手工工匠的劳动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的双手如何创造出具有个性的产品。可是在大机器生产中,人们似乎很难相信那么丰富的工业文明是由工人的这些看来毫无创造性、毫无个性的动作制造出来的,仿佛创造的主体是机器而不是人。工人的创造性和个性被机器剥夺了。

拉斯金认为,异化人的机器生产不是理想的生产方式,因为它不能为人提供一份“明智的”工作。拉斯金提出,明智的工作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分别是诚实的、有用的和使人快活的,而机器生产只强调了“有用的”这一条。他认为,机器产品的造型是不诚实的产物。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产品的装饰有两个极为明显的一致特征:其一是抽象的形式美,不论是出于手工还是机器都一样;其二是能体味人花在上面的心血和劳动。”^[6]其中,第二个特征点是核心,因为抽象的形式美是人的心血和劳动的结果。但是,拉斯金认为

机器产品体现不出人的价值,因为“人的心血和劳动”完全看不到。其理由是:工人在工厂的劳作过程中,经过分工后,他们只能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不可能对产品有整体的、“人性”的认识和体会,也不知道自己劳动造出的最后成果。所以,这些经过机器制造的产品无法体现出工人的“用心”。在工厂里生产的工人不可能像传统手艺人那样对产品进行来自内心的感知和忠实的美化。据此,拉斯金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是缺乏诚实的、充满“虚假”的劳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随着机器运转而按部就班劳动的工人也难有快乐。

至于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认识方式运用到对生活中事物的理解现象,拉斯金毫不掩饰对它的鄙夷,并加以嘲讽。拉斯金在他的《英国山楂花》一文中,以对“七种叶子”的植物学理论的讥讽表明了他对科学主义的反感。在文章中他讲到,他的一位朋友在一个讲座上学习到的关于植物学的知识,“……她告诉我她首先学到了‘七种叶子’……接着我的朋友告诉我,她以前从没想到花瓣也是叶子……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讲座上说:‘如果能使听众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花这种东西,讲座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从这句话中你得到现代科学总的趋势和目标的最完全和最令人信服的概括了吧。它是关于植物学的讲座,其目的是向人们说明没有花这种物质,如果是关于人类学,其目的肯定是要说明没有人这种生物了……没有人这种生物,只有机械装置……只有……猿的变形物质。”^[7]对于理性主义将世界简单的本质化处理,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排除主观感受的认识论,拉斯金表现出了他的敌意。

为了应对机器大生产对人文主义空间的挤压的局面,拉斯金积极地提出了对产品生产进行改造的建议。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拉斯金提出了两项对策:一是恢复传统手工艺,使产品充满人的印记;二是普及艺术化教育,让工人具有艺术审美能力,从而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将充满“人情味”的艺术融入“虚假的”机器产品。

拉斯金认为,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才是真实的劳动,因为它符合了明智工作的条件,符合了产品装饰的特征,体现出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威尼斯

的石像》中,拉斯金谈到哥特式建筑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设计工作中,条理化、规则化处理是“工具”的行为,只有那些非规则的、非精确的,甚至“粗糙的”,但经过思考和尝试的做法才具有人性威严。他说:“你可以教会一个人相当迅速地十分精确地画出一条直线,把它刻出来,或者画出一条曲线,把它刻出来,或者把任何数目的给定线条或图形临摹下来或刻出来,你会发现他干的活在同一类活计中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你要求他对任何这类图形加以思考,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能用自己的头脑想出更好的图形来,他就会停下来,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犹豫不定,他要思考,十之八九,他会想错,十之八九,在他以一个会思考的人的身份工作的时候,他头一下就会出错。但是,尽管如此,你已经使他成为一个人。在这以前,他只是一部机器,一个活工具。”“如果你想使他成为一个人,你就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工具。只要让他开始想象,开始思考,开始尝试做值得做的任何事情,机械式的精确性就马上一扫而空。他的全部粗糙性,他的全部迟钝性,他的全部无能就出现了,但是,他的全部威严也出现了。”^[8]

谈到普及艺术化教育,拉斯金指出:“对那些被英国机器生活中的绝望和单调包围着的人们,设计发明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聪明和智慧达到很高的程度——无论是从感觉的精确上说还是从目光的犀利上说;但工人通常都缺乏设计的能力。假如你们想让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你们必须给他们材料,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环境。”^[9]拉斯金认为,提供给工人一个轻松和良好的环境条件是设计的前提。这种环境指的不仅是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拉斯金建议废除高雅艺术和实用艺术的等级之分,普及大众化艺术教育,“让人民也享受艺术,相信艺术”^[10],通过提高产品生产者的审美能力,将艺术融入“虚假的”机器产品生产过程,从而达到使产品“人文化”的目的。

拉斯金强调的产品生产应“以人为本”的观点在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机器生产的批判和改良的观点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继承和发扬,并由此开展了影响深远的以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为首

的手工艺复兴运动。

拉斯金是现代设计理论的先驱者。他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提出的改革机器生产的两种观点——复兴手工艺和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观点——成为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奠定了人文主义在现代设计中的地位。但是,拉斯金的一些观点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例如,他将机器大生产的生产弊端归咎于机器本身,将历史的判断转化为普遍性判断。但是,他对人文主义的坚持,对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维护,在现代设计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并且成为现代设计发展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 设计——机器文化的“补丁”

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生命存在。人是以自己的意向性活动来建构自己的文化世界——人要以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世界,使它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人化”的、成为人的“亲切”环境,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必需品的来源。自然世界是作为质料进入人的活动中。人改造自然是为了适应自己的生活目的。而实际上,这是人对自然世界对他的威胁的一种“回应”,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世界。因为,人总是想超越出自然世界对自己的制约,活得更好些。

同时,任何个人都要在与自身,以及和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个协调的、相互可以容忍的、可以和睦相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指物质方面的,更是指精神方面的。人在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使大家共同社会化,形成一种共同可以接受的组织形式,使每个人在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中都达到一种完美和自由。但是,社会化本身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制约,而人们的社会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以这种相互制约关系为表象而充分发展人的个性。

所以,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还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的活动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表现方式,总是有意向的,这个意向性是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这种特征必须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进行考虑。而机器文化则片面地考虑到物质性的自然,忽视了协调人自身内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指出,在工业大生产之前,机器的形象一直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说:“笛卡儿处在巴洛克时代,那时人们正在制造自动芭蕾舞演员、动物和其他自动机械,那时机械学的确成了一大热门。笛卡儿也对那些玩具着了迷,并且他自己也动手做了几个。因此,机器的形象成了一种模式,17世纪机器的原型就是钟表。在钟表里面,整体的动力学性质的确是由个体部分的特性所决定的,钟表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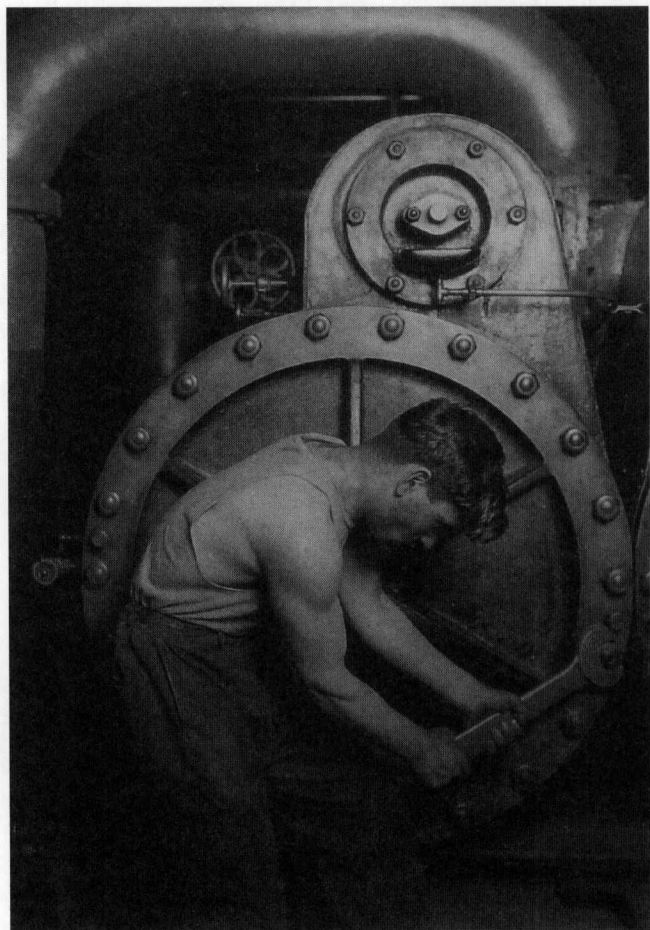
在近代,机器成为一种人的认识和行为的模式——遵守机器工作的原理,以机器作为样板,一切都像机器那样运作。机器被看做不是神的神,人们对机器顶礼膜拜,推崇至极。在机器文化中,一切像机器那样准确、精细、有序、有效的工作特征都被冠以“机器”的美称。1748年,法国医生兼哲学家拉美特利匿名出版的《人是机器》一书,充满了对人体生理机能精细程度的赞美。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是一种类似于机器的体系。美国总统杰弗逊把政府称为“机器式政府”。德国地理学家盖约特说:“地球真是一部奇特的机器,它的所有部件共同协调地工作着。”^[12]这些言语都是借机器之名,希望或赞叹事物能够具备机器的品质。虽然我们如今不那么热衷于称赞“机器”,但是在我们通常的话语中,如“战争机器”、“宣传机器”、“赚钱机器”等,仍然可见机器的影响力。

机器与手工工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具。采用了机器,就意味着传统的手工劳动形式的根本改革。过去,工人用手工工具劳动,工人是主动的,工具听人的指挥;现在,工人用机器劳动,工人则是被动的,要听从机器的指挥,工人像是机器的仆人。在机器的面前,工人的劳动动作发生了质的变化,变得十分简单、单调,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长时间里不断重复老一套的动作。实际上是工人的动作在配合机器的动作,二者的动作是十分相似的。机器不容许工人有自己独特的动作、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动作。于是工人的双手实际上成了机器的一个零件。似乎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又使人成了机器。马克思说:“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于机器

的动作。”^[13]

在机器生产的发展下,工人劳动的动作不是变得更复杂,而是更简单了。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工人劳动的动作就越简单。使用自动化机器,工人不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甚至不需要动脑筋。机器的结构越复杂,工人的动作就越简单。机器不需要使用机器的工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需要他们支付什么智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似乎可以说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就越来越像机器。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机器生产中,人的本性被扭曲了。他写道:“机器劳动消除了肌肉的多方面的紧张,它不让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



1920年 蒸气机装配工 摄影 刘易斯·W·海因

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此外，它使工人的智力和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就从属于它。这——‘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皮带和纱锭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法西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14]

机器生产同人的本性发生了根本矛盾，人类的物质生产同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矛盾。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具有从属性、简单性和单调性，这同人的主体性、复杂性和创造性是对立的。机器的功能是把人的主体的、复杂的、创造的劳动转化为客体的、简单的、重复的劳动。前者是机器取代工人的劳动，后者是工人的劳动表现为机器。

相对于神学文化而言，机器文化是一种社会进步。它改变了人们执著于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的方式，使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真实的世界中。但是，机器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有点矫枉过正，走得太远。它片面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加剧了物质和精神的区分和对立。这导致了种种破坏性事端的产生。但是，既然机器文化是人的创造物，人就有改变这种文化的主导权，人也有自身寻求出路的本能。在诸多的出路选择和试验中，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一直将由机器生产所带来的诸多现象和成果称为机器文化。其实，机器文化只反映了西方文化含义的一部分。文化在西方的含义很多，但都可以总结为：文化是人不断优化自己生存环境的过程。这种优化，既是指将自然界改造得更适宜人的生活，也包含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优化。李鹏程在《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中对“文化”作了精彩的阐述，值得大段引用。“……根据人的这种自我要求，‘文化’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体质上的，即人的身体上的

优化，这种活动便是体育；第二，精神上的优化，在这个方面又包括三个方面：知识的不断增加，意志力（道德能力）的不断完善和情感（审美能力）的不断丰富；第三，活动技能上的，也即古代人们所讲的‘艺’，‘艺’作为活动技能，它实际上就是广义的劳动能力。人对自己的这种直接性的优化活动，是优化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实证化的科学思路，文化被狭隘地理解为科学和工艺，因而，文化的意义整个地被外在化了，似乎人活着就是为了‘征服’和‘改造’世界。为此人才需要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成了人内在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文化规定性，而且，它们的目的也不在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状况和品质，而在于它们是否能有效地作用于人外部的对象世界；于是，智育文化（理性）、技术文化、强烈的对象性意识，便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主旋律。以至于当代的人们把‘文化知识’合为一谈，或者把‘文化’与‘知识’混为一谈，似乎‘知识’就是文化的全部含义。如果从我们在上面对 cultura（作者注：拉丁文，英文是 culture）的全面陈述来看，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种主智主义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它淡化了、以至忘掉了文化的根本目的——人自身，忘掉了人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是人根本的文化使命。”^[15]

读了上述对文化的阐述，我们知道机器文化只是文化肢体上异常发达的一部分。当它欲阻塞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时，它就成为人们斥责的对象。人们斥责过后，当然是提出均衡发展的方针。对于机器生产，人们提出应该加强精神优化，其中，审美能力（情感）的优化是一个主要手段。这样，在机器文化背景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设计。

设计是一种赋予人们生活中的物质形式以审美特征的行为。设计为人们的生活世界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秩序，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性的秩序。设计作为一种赋予生活世界以形式和秩序的创造性行为，它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基于人类自我优化的需要。设计兼顾了机器文化的物质性和生活世界中的（精神）超越性，它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人们优化生活状态的一个有效方式，它是对机器文化批判的成果，这是弥

补机器文化缺乏人性化的“补丁”。

参考文献:

- [1]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版.P103—104
- [2]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见:朱红文.《机器·技术与设计》.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版.P252
- [3]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钧、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版.P13
- [4]尼采.《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版.P33
- [5]波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版.P354
- [6]董占军编.《外国设计艺术文献选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版.P24
- [7]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匡咏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P247—249
- [8]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P449
- [9]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匡咏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P240—241
- [10]同上.P241.
- [11]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说未来》.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版.P239
- [12]詹姆斯.《地球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P183—184
- [1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版.P164.
- [14]同上.P167—170.
- [15]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版.P72—73